



348031

本书责编：秦伏男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印刷一厂
1990年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育 毒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大京兆，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一番正本清源，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论衡》是东汉前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倾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和帝永元中（公元89年至公元104年）病逝，享年七十余岁左右。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先祖因从军有功，受封于会稽郡阳亭，后失去封爵。祖父王汎，因“横道杀伤，怨仇众多”，携家徙居钱塘。父王诵，在钱塘（今杭州市）又因与“豪家丁伯等结怨”，迁徙浙江上虞定居。

王充八岁进学馆学书法，十五、六岁时赴洛阳太学求学，从著名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彪学习。

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

大约在三十二岁以后，王充返归乡里，先后担任上虞县功曹，会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从事（五官掾），因与长官政见不合，被“废，退穷居”，以教书为业。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登花甲的王充到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郡避难，应刺史董勤之召，到州里任治中（州刺史的助理）。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罢州家居，友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极力推荐，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王充晚景凄苦，“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篇》），处境艰难，唯以著书为事。

据《论衡·自纪篇》，王充一生所著书籍，有《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多种。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论衡》一部。学术界有人说王充的《讥俗》、《节义》、《政务》、《养性》诸书已混杂于今本《论衡》中；有人说这些书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虽然可在今本《论衡》中探知，但它们已经佚失了，今本《论衡》不包括它们①。

①参见蒋祖怡《王充卷·自序》。

今本《论衡》有三十卷和三十五卷两种，皆为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四《招致篇》仅存篇目，无正文，实存八十四篇

王充生活的时代，正当东汉王朝的前期，汉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末年暴发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的教训和西汉统治的经验，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封建社会因此而进入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刘秀继承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并大肆宣扬西汉后期流行的谶纬迷信，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他还说自己所以能当皇帝，就是因为应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谶言，因而提倡用谶言决疑。凡“名应图策”者，都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到汉章帝建初四年，章帝亲自在洛阳白虎观主持召开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参加的大会，“讲议五经同异”（《后汉书·章帝纪》）。根据会上的辩论写成的《白虎通义》，就是融合儒家经书与谶纬迷信为一体的作品，它集中地表达了东汉统治阶级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一些代表地主阶级中下层利益的知识分子，由于从自身所接触

的下层社会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古代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并正确地运用汉代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成就，因而能在更高的思想文化层次上维护封建统治，批判和否定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及谶纬迷信思想。王充的《论衡》和他前辈学者桓谭的《新论》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桓谭及其所著《新论》坚持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论，激烈反对“天人合一”，“极言谶之非经”提出治国应以“仁义正道为本”，因此被刘秀斥为“非圣无法”（《后汉书·桓谭传》），几乎杀头。王充继承并发挥了桓谭的思想，更加旗帜鲜明地向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及谶纬迷信思想提出了挑战。

王充《论衡》一书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朴素的元气自然论。

元气一名，始于《春秋繁露·王道》和《淮南子·天文训》，被认为是天地所由产生的元始的气。元气与气相联系，说明它是由先秦诸子的气概念发展来的。但是，在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中，由元气组成的自然之天变成了“聚众精以自刚”的神灵之天，具有了道德和灵性。天所产生的万物，都是有目的的，即“天生五谷以养人。……天之常德，在于利人”（《春秋繁露·止雨》）。后来，

讖纬家把董仲舒的这种思想进行神学的解释，说“中宫大帝……含元出气流精一也”（《春秋·文曜钩》）。认为元气是由神产生的。

王充则不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元气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元气是自然界的本原，天地间的一切，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地合气”产生万物，产生人类（《物势篇》）。自然界的物类所以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构成它们的元气不同。如，“日者，火之精也”（《感类篇》）。雷者，太阳之激气也”（《雷虚篇》）。“万物之中有智慧”（《辨崇篇》）的人，是“阴阳气也”（《订鬼篇》）。元气构成天地，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受元气支配。万物生时“禀气于元”，万物死后，“复归元气”（《论死篇》）。天地作为由元气组成的物质实体，没有口目，没有嗜欲，没有意识，是自然无为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无心于物而物自化，无意于物而物自生”（《自然篇》）。

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在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大肆泛滥的汉代，正如黑暗中燃起的火炬，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有力地批判了统治阶级把天奉为造物神的正统思想。

王充进一步说，天地间的一切自然灾变也是由元气的变化产生的。“灾变时至，气自为之，”“气变之见，殆自然也”（《自然篇》）。并不是什么天对人的谴告，他说所谓天能谴告人的说法，不过是“衰乱之语”，是儒生们主观臆造出来的。这就揭示了“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的虚伪性。

王充运用元气自然论来观察认识事物，坚持了一条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汉代谶纬神学的认识路线，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们说“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实知篇》），能“生而知之”。在他们看来，圣贤人物的知识是先天的，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先知者有“达视洞听之聪明”，能够预见“方来（未来）之事”（《实知篇》）。王充反对这种先验论的观点，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实知篇》）。圣人、贤人所以能先知，原因在于他们事先对事物进行了“阴见默识，用思深秘”的细致观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达视洞听之聪明”（《实知篇》）。王充指出：“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明白）”（《实知篇》）。圣人也需要学习，“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实知篇》）。

王充把人的认识过程归纳为三个步骤：（1）、人的认识要以感觉经验为依据，“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实知篇》）。反对离开感觉经验去认识事物。（2）、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主张对认识内容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即运用“揆端类推”，“方比类物”，“案兆察迹”，“原始见终”等方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改造功夫。（3）、对任何事物所做出的结论，都要用事例进行检验。“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知实篇》）。王充提出的认识方法，充满着理性精神，符合认识论的科学规律。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基于唯物主义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坚持了无神论观点，对汉代各种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王充说天是自然之天，这就否定了把天当作造物神的唯心主义思想。针对当时流行的“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教，王充指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质问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他用火和燃烧物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关系，说：“人之死，

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明，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实。”“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死篇》）这就指明了人的精神必须依赖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没有什么死人的灵魂，从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批判了灵魂不灭的谬论。

同批判“人死为鬼”的说教相联系，王充批判了汉代的淫祀之风，指出人们所祭祀的各种鬼神，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对天地、社稷、山川、百神的祭祀，不过是报功的意思。如祭祀社稷，就是“报生谷物之功”（《祀义篇》）。人们祭祀祖先，也是“缘生事死，示不敢忘先”（《祀义篇》），“宗庙先祖，己之亲也，生时有养亲之道，死亡义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祭意篇》）。所有的祭祀对象都是无知无欲的东西，“百神无鬼，死人无知”（《祭意篇》）。祭不祭祀鬼神与人们的祸福毫无关系。这就把鬼神赶下了神圣的祭坛，揭露了祭祀求福免祸的虚妄，这在汉代是相当进步的。

王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渊博的学识，用他犀利的笔锋对汉代流行的荒谬邪说、迷信、禁忌开展了广泛的、几乎是无所不包括的批判。他批判“天地故生人”、“天用五行之气生万物”（《物势篇》）的神学目的论，说天地不能“故生人也”。人和万

物都是“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物势篇》）的，天不能依照“五行相生”的教条来生产人和万物。他批判所谓天能赏善罚恶、“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福虚篇》）的说教，指出在社会上，有人“多横恣而不罹祸”；有人“顺道而违福”（《祸虚篇》），那么天的福祸之应究竟在哪里？如果说天能按照人的德操赐给人年寿，那为什么“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福虚篇》）？他批判君主政治能影响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天人感应谬论，说水、旱、晴、雨是阴阳之气自然运行引起的自然变化，“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与君主的政治无涉，不论君主怎样施政，都不能改变“春生而秋杀”的自然规律。那种认为君主能“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寒温篇》）的言论，是儒生们捏造的欺人之谈。他批驳各种迷信禁忌，揭露各种迷信骗术，说“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后，不能不有吉凶”，那些江湖术士就利用这一点，“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见吉则指以为前时择日之福，见凶则刺以为往者触忌之祸”（《辨祟篇》）。他指出所谓“卜者问天，筮者问地”（《卜筮篇》）纯属谎言，“卜筮之人空钻龟而卜，虚揲蓍而筮，戏弄

天地，亦得兆数……由此言之，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明矣！”他告诫崇尚迷信禁忌的人们说：“诸占射祸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辨祟篇》）。对于消灾弭祸来说，“解除无益”，“祭祀无补”，“巫祝无力”（《解除篇》），因为祸福的产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解除篇》）。他深刻地指出：“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讥日篇》）。迷信禁忌的流行只有利于那些“巧惠（慧）生意，作知求利，惊惑愚暗，渔富偷贫”（《辨祟篇》）的江湖骗子。他批判方士所宣扬的人可以“得道仙去”和“度世不死”的虚妄之言，指出：“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道虚篇》）王充认为，世界上的万物，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终。人作为万物的一种，无法逃脱生与死的辩证发展过程，所以根本不可能“度世不死”。

不但如此，王充针对儒家大师孔孟的某些言论和思想也展开了诘难。在汉代，孔子和孟子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已被尊崇为“圣人”和“贤人”。王充敢于打破封建禁区，批评“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圣贤所言皆无非”，这是十分